

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周育民

中国会党历史悠久,根深叶茂,是封建社会末期突出的社会现象,亦是中外瞩目的旧中国的严重社会问题。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这一课题也日益引起重视。

中国会党,从严格意义上说,指的是以歃血结盟、兄弟结义方式联合起来的秘密结社,其中以天地会影响最大、最为典型。但对于天地会研究首先并不是作为学术问题而是作为社会政治问题、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英、荷海峡殖民地发端的。

1863年春,荷属东印度公司在苏门答腊巴东地方(Padang, Sumatra)从一个华侨家中搜获了一批天地会文件。由于华侨中天地会活动频繁,荷兰当局十分重视,把这批文件交给汉文翻译官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进行研究,施列格遂根据这批文件并参考其他资料写成《天地会》一书(ThianTi Hwui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①这本书对天地会的历史、章程、暗语、歌诀作了介绍,错误地认为天地会是西洋的共济会(Free Mason)向东方发展的结果,并武断地认为闻香教、白莲教即天地会。在施列格研究天地会之前,英属殖民当局已设专人进行研究,其成果为施列格所吸收。之后,英国殖民地当局便派人加入天地会,调查内幕。新加坡华民政务司司长毕麒麟(Pickering)成功地在福建加入天地会支派兴义会,搜集了许多天地会的资料,由其助手士多令(Stiring)整理,与活特(Ward)合著《洪门》(The Hung Society),于1926年出版。

日本对于中国会党的研究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辛亥革命前,日人平山周深入中国内地,打进会党内部,并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广泛建立了联系,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撰写了《中国秘密社会史》。该书中译本于1912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②这部著作不仅利用了天地会的文件,而且吸收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会党的研究成果,因此其情报价值和史学价值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全书六章,分述白莲教、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同盟会和光复公会。其中保留了不少各该组织的重要原始文献。这部著作已初具中国秘密结社专史的规模。

中国的会党史研究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的。1908年,陶成章发表了《教会源流考》,首次指出中国“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为白莲教和天地会,概述了这二大团体的历史、宗旨、制度、相互关系及革命党人运用这两种势力的利弊。在这篇杰出的论文中,陶氏关于会党史最重要的观点有:(1)“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一非天地会之支派”。(2)洪门“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3)洪门宗旨为反清复明。

① 中译本为《天地会研究》,薛澄清译,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版。

② 平山周从山口昇(日本间谍)对外务省的报告《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中抄录了不少材料。

(4)洪门发展“由南而北”。(5)教门与会门历史上有过联合,大刀会、小刀会系兼具教、会特色之团体。(6)青帮、洪帮“源流本出洪门”。(7)洪门组织”专崇义气”,“山堂分峙”,实行九级会员之制,另有三十六誓等规约。陶成章的这些观点涉及到中国秘密结社的分类、天地会的源流、宗旨、分布地区、与教门和青帮的关系以及洪门制度等,几乎包括了党史研究的所有重大问题,虽然陶成章的这些观点不尽正确,但就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至今还吸引着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探究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开山祖。没有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就不可能有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

二

国人自编中国会党史的任务,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政府撤销国史馆,亦由北大接办,设立国史编纂处,蔡兼处长。蔡元培计划编写一部《国史前编》,便与张相文联名致信孙中山:“盖以民国成立以来,群言混淆,是非不明,不有信史,曷以昭示来兹。且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故元培与编纂诸君,公同斟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斯其难也。惟兹诸会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境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阅数十年间,常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所幸先生以创始元勋,不吝教诲,征文考献,皆将于是赖之矣。”孙中山答函称:“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①蔡、张再复,似不完全同意孙中山的观点,以为同盟会兴起后,会党“乃与共和有直接关系”,“且亦多吸收各会分子,此中离合之迹,诚未易分明,要非广事搜罗,不足以资考证。”以后虽未见《国史前编》之结果,但单独编写秘密会党史的设想毕竟由孙中山提出来了。

民国时代,罗尔纲、肖一山等不遗余力,出版了一批会党史史料。仅天地会的海底就有贵县修志局本、守先阁本(均收入罗尔纲的《天地会文献录》)。三十年代肖一山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中发现一批天地会文件,回国后整理出版了《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一函,李子峰据各种海底编辑了《海底》一书。时过境迁,帮会内部的许多机密亦无严守之必要,因此,帮会为发展组织、美化历史,也出版了一批文件,如陈培德的《海底》、张贊的《金不换》、群英社的《江湖海底》等,帮会常识手册有《洪门会概说》、《洪门常识问答》、刘师亮的《汉留大观》、胡利民的《民族精神》、卫聚贤的《中国的帮会》、朱琳的《洪门志》等。这些书籍的出版,不仅保存了一批清代遗留下来的天地会文件,而且提供了若干帮会内部的口传史料。

学术界对会党史的研究集中于天地会的起源上。一般都相信天地会文件中所称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的说法,但因无正史根据,所以学者都致力于论证康熙十三年说。1929年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一书出版,认为天地会西鲁故事中的火烧少林寺,是指郑芝龙全家在北京被杀之惨史,万云龙即郑成功,陈近南即陈永华,认为天地会系郑成功所创。罗尔纲又以康熙朝《大清律例》中有处罚“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条文作为新的论据。周贻白的《洪门起源考》则认为西鲁故事的背景是郑成功旧部林兴珠部藤牌兵的经历。^②肖一山根据伦敦的天

①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41—243页

② 载《东方杂志》第43卷第16期,1947年10月

地会文件认为天地会创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948年王重民发表《天地会始于明季说》^①。第一次突破天地会的传说，直接根据正史材料提出万历十年破获的票党即天地会。对天地会的研究还涉及到其他方面，如肖一山的《天地会起源考》，指出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指出了天地会与清代前期层出不穷的朱三太子案的关系。罗尔纲的《水浒传与天地会》认为天地会的制度、风貌受到了《水浒传》的强烈影响。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还主要集中于洪大全问题上。

总之，洪门历史在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心目中还只是一幅很朦胧的图画，要勾勒出这幅图画的细部，这在战乱频繁的旧中国是不可能的。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1941年）、戴魏光的《洪门史》（1947年）这些著作基本上是在缺乏学术研究基础的情况下写成的，但这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它们的价值在于勾画了民国时代的专家对于会党史的一般认识，并且保存了一些帮会内部的秘闻，提供了撰写会党通史的初步经验。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学术标准去评价这些著作。

三

大陆解放后，会党史的研究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而纳入农民战争史的范畴中去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会党起义的研究从而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会党史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形成专门研究课题的有会党一般、天地会、哥老会、咽噜、青帮、林爽文起义、黑水党、棒棒会、把子会、尚弟会、闽南小刀会、上海小刀会、宁波双刀会、莲蓬党、金钱会、红钱会、大成国、升平天国、李洪起事、余栋臣起义、自立军起义、龙华会、洪江会、共进会、江湖会、刀客、中华国民共进会、社团改进会、海外洪门等，会党起源、性质、作用及其与太平天国革命和辛亥革命的关系，是大陆史学界最关注的问题。据初步统计，到1983年底，发表的会党史文章约八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和资料约七十余种，其中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以后问世的。

在天地会起源的问题上，1964年蔡少卿发表了《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②。首次利用档案史料提出了天地会是由洪二和尚万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在福建漳浦创立的新观点。这使得天地会起源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继蔡少卿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秦宝琦等同志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搜集、整理了现存档案馆的鸦片战争之前的天地会资料分七册出版。根据对清朝档案的进一步研究，秦宝琦得出了与蔡少卿相同的结论，认为可以把天地会创立年代定在乾隆中叶。^③ 胡珠生、赫治清批评了蔡少卿、秦宝琦的观点，并进而为康熙十三年甲寅创立说提供了新的论据。^④ 哥老会作为天地会支派的传统观点也受到了挑战。1952年陈湛若、胡珠生首先提出哥老会起源于四川的咽噜。^⑤ 朱金甫根据档案史料，认为哥老会是由天地会支派仁义会、江湖会发展而来。^⑥ 蔡少卿则主张哥老会是咽噜与白莲教、天地会相融合的产物。^⑦ 在会党的性质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是会党反清复明的政治团体还是经济上的社会互助团体，其主体是游民还是农民。在会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问题上，罗尔纲的《太平天国与天地

① 载《子曰丛刊》第五辑。

② 载《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一期。

③ 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第1辑。

④ 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历史学》1979年第4期；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清史论丛》第五辑。

⑤ 陈湛若、胡珠生：《哥老会起源初探》，《新史学通讯》1952年第12期。胡珠生后来放弃了这一观点。

⑥ 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

⑦ 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会的关系问题》具有突破意义。有关太平天国时期会党运动的专著有谢兴尧的《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方诗铭的《上海小刀会起义》、胡汉生的《李蓝起义史稿》等。长期笼罩于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洪大全问题的阴影也基本得到了澄清。太平天国以后的会党研究比较薄弱。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研究主要集中在会党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会党的阶级成分和历史作用等问题上，学术界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在与党史有关的青帮史、教门与会门的关系史研究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马西沙、程款合著的《从罗教到青帮》基本上澄清了在青帮史研究中的许多混乱观点。^①

喻松青的《天理教探研》指出了广东天地会与林清、李文成起义的关系，^②蔡少卿对于湖南斋教与天地会的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③五十年代，台湾省还笼罩着一层反攻大陆的气氛，天地会创于郑成功说盛行一时，正是这种政治气候的产物。六十年代下半期以后，正值大陆十年动乱期间，党史的研究在台湾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继大陆学者蔡少卿提出乾隆二十六年说之后，台湾学者戴玄之于1968年又提出乾隆三十二年说。^④但这个说法很难成立。七十年代，台湾学者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翁同文发表了《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一文。^⑤在这篇杰出的论文中，翁同文认为在天地会以“洪”为姓之前，曾有过以“万”为姓时期。吴三桂起兵之后，已经降清的河南总兵蔡禄（即原“以万为姓”集团中的万七）率部谋叛，为清军围捕遇难。所谓少林寺僧兵退敌立功，清帝负义遣兵焚寺即影射蔡禄的经历。蔡禄余部脱逃回闽，与已经反清的万五（即长林寺僧达宗）重聚，结天地会。达宗和尚是天地会文件中明确记载的创始人，从搞清达宗的身世入手，论证天地会的起源，的确是独辟蹊径的创举。1970年，庄吉发又发表《清代天地会源流考》，^⑥认为天地会是由异姓结拜组织及地方械斗团体发展而来，与社会经济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并非倡自一人，起于一地。庄吉发这里所提出的广义天地会的概念，实际上即是会党的概念。庄氏对清代会党史研究的成果甚丰，大部分都反映在他的专著《清代天地会源流考》一书中。^⑦台湾学者陆宝千的《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也是研究太平天国时期广西会党起义的一部力作。^⑧在秘密会党资料的出版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古亭书屋出版的一套“秘密社会丛刊”，影印出版了一套民国时期出版的一些稀见的帮会文献。

为了推动中国会党史研究，1984年10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一次近代中国会党问题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散发了由魏建猷教授主编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⑨该书收录了近千种有关中国会党史的中文论文和著作的目录及提要，基本上反映了1983年以前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会上集中讨论了中国会党的源流、性质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

① 载《南开史学》1985年第1期。

② 载《清史研究集》第四辑。

③ 蔡少卿：《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④ 戴玄之：《天地会的源流》，载《大陆杂志》第36卷第11期，1968年。

⑤ 载《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史学论集》，台湾省华岗出版社1977年版。

⑥ 载台湾省《食货》月刊复刊第9卷第12期，1970年3月。

⑦ 台湾故宫博物院丛刊，1982年版。

⑧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6年出版。

⑨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会议的成果最后选编为论文集出版^①。1988年10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又召开了第二次中国会党史学术讨论会,集中讨论了会党的阶级结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②在此前后,还出版了一批会党史研究的专著,如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秦宝琦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徐舸的《清末广西天地会风云录》等。

四

中国会党史的研究如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算起,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学术界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就整个研究况状来看,这门学科还不够成熟。

在理论建设方面,中国还没有建立适合中国本身国情的秘密社会学。西方的秘密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在本世纪开始出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批成果,为历史学家进行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有些西方史学家企图运用秘密社会学的观点来说明中国秘密结社的问题,由于社会文化的不同,往往不甚切合,有的学者干脆否认中国的会党是秘密结社。因此,要使中国会党史研究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必须建设中国的秘密社会学,确立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对象、任务、方法,形成一门较为完备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会党史研究的领域必须拓展。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偏见,一提会党就是天地会,其他会党均为天地会支派,这种偏见必须克服。会党史的研究是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分,必须放到整个秘密结社的大系统中加以研究。会党作为民间结社的一种方式,从来不是一个自行完善的封闭系统,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教门、青帮、幅党、土匪、行帮等等各种组织发生融合的现象,并且从大社会中不断吸收适合自己发展的因素和机制。脱离大社会、脱离整个民间结社史的发展,会党史的研究是搞不好的。民国时期会党史的研究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会党史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中国秘密社会学的建设需要社会学家的合作。会党诗词歌诀、秘语手势的研究需要进行俗文学、语言学的研究。会党信仰、仪式的研究还需要宗教史家、传播学家的合作。这些工作过去是被忽略的。有位德国学者说他搜集了四千多条会党秘语,我们自叹不如,自立会飘布上有句话“红羊劫运日相催”,有位学者就望文生义,认为“红羊”是指洪秀全、杨秀清当年领导太平军起事,熟悉中国民间宗教的同志马上就可以告诉我们,这是白莲教中最流行的“红阳劫变”观念,而不是指太平天国的洪杨起事。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会党中也有白莲教的信仰成份。如果其他学科的专家来研究中国会党,一定还会发现更多的问题,提出更多启发意义的见解。

会党史研究是一门大有希望的学科。粉碎“四人帮”以来,大陆史学界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我们也日切盼望与台湾同行共聚一堂,展望中国会党史研究的未来。

① 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见《近代中国会党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1期。

② 《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共收入论文23篇。

③ 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见《第二次中国会党史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